

从新进化论看民族与文化的发生

刘景慧

(怀化学院 学报编辑部, 湖南 怀化 418008)

摘要:在古典进化论看来,民族及其文化的发生是一个直线进化的过程。文化传播认为,文化的产生极其艰难,只能是有创造力的民族产生以后,通过文化传播而实现了文化的发展。民族的发生包含:首先是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的出现;其次是异文化的分别出现以及异文化人们共同体的并存。尽管人类历史自始便具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基本的统一性,但是,人类从这样的起点走出极为漫长的路途后,人类文化依然呈现出千差万别,而体现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关键词:民族;文化;产生;发展

中图分类号: G 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942(2008)01-0011-05

关于民族及其文化的发生问题,在人类学领域有较多的探讨,尤其在人类学创建的早期,不论是经典进化论还是文化传播主义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从新进化论的理论出发,认为民族的发生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的出现;二是异文化的分别出现以及异文化与人们共同体的并存。从这一认识出发,对民族与文化的发生进行分析说明。

关于由文化所维系的人们共同体的出现,在文化人类学传统理论中曾有过严重分歧,主要原因出在古典进化论派和传播文化学派的理论出发点上。古典进化论认定民族是由低级到高级单线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人们共同体。假定人类存在过“无文化”或“前文化”时期,^[1]那么只有当人类进入了有文化的时代,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才在地球上出现,也就是说才有了民族。这就使人类学“从一开始就以时间进化论的构想为基础,把共同体以外的‘非我’实现放置在历史长河的‘原始’一端,以确立现代‘我类’一端的文明优势。其对‘非我’在时间上的排抗造成时间的空间化,使其整个研究的大前提表现为把‘他们’作为‘我们’人类的过去来研究,而不是关注‘他们’存在的现实意义。‘他们’的现实状况必然翻译成‘我们’的过去才能获得起存在的意义。”^[1]

而传播学派认为创造文化是十分艰难的,并非任何人都有创造文化的能力。如果说假定地球

上存在或是普遍存在过没有文化的人们共同体,只有在文化传入之后才形成以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这一命题成立的话,那么这一富于哲理性的命题很有可能使讨论陷入“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循环中。

正是基于这种困惑,美国的文化相对主义和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先辈只好搁置了这一问题。新进化学派兴起之后,这个问题才被重新提到讨论日程上来。基于对文化本质的深入理解,以及对当代各后进民族的深入研究,解决这一问题的取向和深度均有所提高,从而摒弃了“无文化”、“前文化”之类的含混命题。

然后,关于异文化的分别出现以及异文化与人们共同体的并存问题,在文化人类学理论中也曾有过严重的歪曲。古典进化学派总是力图把原始社会想象得尽可能无知、混沌,认为只有如此才合乎人类社会的初始“真情”。而传播学派则从另一个角度向人们勾画了“无文化”的人们共同体是如何在浑浑噩噩中被动等待文化传入的无可奈何的图景。不论是古典进化学派还是传播学派都把处在人类的童年期想象成原始的混沌状态,进而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去细究原始人群间有文化差异与否的问题。一直到20世纪,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尤其是文化相对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兴起,人们才开始注意到原始时代不仅存在不同共同体的文化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还十分巨大。

文化以及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的起源与人

收稿日期: 2007-10-08

作者简介: 刘景慧(1953-),女,河北柏乡人,编审,主要从事民族文化与编辑学研究。

和动物的区别是一个极易相互混淆的两个例证。因此，我们只有先确定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才可能进而确定文化的起点。

从生物本质来看，人类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动物，是动物中的一类。但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凭借的当然不是人类的生物特性，而是其他类动物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特性，这就是行为的意识能力，即人类具有行为影响及其后果的本领以及发现自然现象相互联系的能力。在这种特异能力的作用下，人类进而具有经验认知、经验积累、经验传承的特有技能。在这三种技能的作用下，人类也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文化以及由文化所维系起来的社会。社会出现之后，人类便告别了动物界，走上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并通过创造文化、完善和发展文化去实现人类自身的发展。为了弄清人类行为意识能力的特性，生物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教黑猩猩使用聋哑人手语，训练猩猩使用工具，观察野生的猴子是否可以学会“经验”等等。这些工作都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成绩，但所发现的结果仅可以证实的是动物特有能力和无法与人类的行为意识能力相提并论。因为这些实验绝大部分是在人的伴随之下进行的，在实验过程中，只是由人向动物传授人的某种“文化”，而不是动物自己积累经验，更不是动物自己去总结出哪怕最简单的经验。

所有这些实验只能表明这些实验动物具有惊人的反射性应付能力，不能将它与行为意识混为一谈。人类与这些动物之间横亘着一条至今尚无法逾越的鸿沟。任何企图以当代动物行为去构想人类早期面貌文化的尝试都注定是无效的。

我们既然承认了进化论，那我们就得一同承认人是由无行为意识能力的动物进化而来的。不过这种承认并不意味着这种人类的祖先与人已经是一种相同的动物的说法是正确的，进化为人类前的人类祖先只能是异于人的动物。问题的症结在于经典进化派的专家们把人类的动物祖先与人类的原始时代相提并论，并把他们认定的原始人理解为不具备正常思维的混沌状态生物。于是在文化人类学前辈的笔下，自然形成了“文化”与“前文化”、“正常思维”与“前逻辑思维”等概念，^[1]也自然产生了以灵长目动物的行为去推理原始民族行为的研究构想。

基于前这些理由，这种构想引导出的结果显然完全无法说明民族文化起源。然而问题并不简

单，由于这种把现代人与原始人两分式的研究法披着一件很有迷惑作用的科学进化论外衣，因而在文化人类学界影响深远，至今仍被某些学派视为当然的研究手段，比如，美国的经济人类学派就力图证明现代经济与原始经济是否有共通之处进行了激烈的论战。^[3]其实，说穿了这种两分法的思想根源不是别的，正是欧美民族在近代一时强大的背景下，受民族本位偏见驱使混淆进化历程中质变概念，从而蒸腾出了“自我想象”的进化观。

现在该是从经典进化论的歧途返回到问题的正道上的时候了。即当追究真正的人类在地球上产生后，多久开始出现文化与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至于人类如何由无行为意识的动物祖先产生的问题，理应留给生物学家们去研究去。从建构文化的生物性前提着眼，生存于距今4万至1万年前的智人，与现代人在智慧上已无质的差别了，即作为构建文化的思维能力——行为意识能力，在4万年前已经完全具备了。当代生物学的研究证明，人类在掌握最复杂的现代科技时，仅仅动用人脑全部智能中的小部分，也就是说人类智能具有巨大的潜在可利用范围。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比智人更早的尼安德特人（生存于20万至4万年前）和早期智人（生存于70万至20万年前），他们的智能虽低于现代人，但是在较大程度上动用其有限智能时，创造出文化也有可能性。加上早期文化适应小、专用性高，所需智能数量上亦相应较小这一情况，在早期智人时代已有文化产生，并有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产生，乃是十分可能的事情。

文化的产生早至早期智人时代，在文献中当然无可凭信的记载，只有考古学才能对文化早期面貌作出说明。据考古学材料可知，远至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有了经验归纳的实证。中国出土的“北京人”化石及伴随旧石器，即为证据之一。“北京人”制作的石器已发现了数万件，这些石器虽然极其粗陋，但是制作已经有一定的章法，是选用一定的石料，沿相似的方向锤击取材，再作简单修整而来的。加工方法的定型化清楚表明，“北京人”不是偶然地打出石器，而是凭借才智归纳出经验，去指导生产石器。人类具有经验积累能力的明证是石球、飞索、猎具和弓箭的发明，以及木材、石头、矛的发明。中国境内山西许家窑遗址出土的石球，时代在20万前至4万年前。

这种石球可以系上绳子，在抛掷中可以绊倒飞跑的大动物，效能很高。这种复合工具的发明标志着若干种单项经验的叠加和综合应用，因此是人类具备完善的经验积累技能的证明。

关于人类的经验传承技能单凭一件工具是无法证实的，但考古学中发现的大型文化遗址一般均连续供当时人类使用达数百年，一直供数代人使用，而且在延续数代的生存中，工具制作、采食对象等遗物基本稳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足见经验不因隔代而失去。这充分显示了当代的早期智人，比如“北京人”已有了完整的经验传承技能，并在社会中稳定下来。这一切有意识的行为完整地结合起来，则表明早期智人已经是在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中生存的有“文化”的人了。

异文化人们共同体并存的起源比较难于证实。这是因为早期智人时代，不同人们共同体之间交往极少，难于留下并存文化交错的考古学物证。加上考古材料的发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时间上往往不连续，这无法直接充作并存文化的证据。不过从间接方式还是有可能证实早期智人时代已有并存异种文化出现。

早期智人时代，人类只能靠采集、狩猎为生，当时是否有异种文化并存，经典进化派和文化传播学派的专家们均未作正面的说明；但是功能学派和鲍亚士学派的专家们却用当代的采集——狩猎民族为对象，进行广泛研究后，宣布即使经济如此落后的民族，其间也并存着十分明显的文化差异。从而间接证明了早期智人时代可能有文化差异并存的。当代生存于北极圈的爱斯基摩族人，靠猎取海生哺乳动物和捕捞鱼类为生，其衣、食、住、行乃至语言、技能等等文化特点均与生活在热带雨林下的俾格米族人迥然不同。后者在文化上完全适应了热带生态下的生境，前者则与冰川环境极度适应。这是今天的例子，但是却清楚地表明同是采集——狩猎经济下的民族，可以并存异种文化。上推到早期智人时代，当时的人类居住分散，自然生态比今天更复杂，从而人类建构的文化更应该专用化，比如上文提到许家窑文化所有者，就以专用石球飞索猎兽，食物、住居、衣着自然会适应这一需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特有文化，因此异文化并存的基础比今有甚。

由于经典进化派和文化传播学派的影响，不少人至今仍抱定原始人比今人愚昧和智能低下的观念。事实上这是一种不符合实情的虚构结论。

今天的采集——狩猎民族，人人会识别生境中数以千计的植物种类，熟练操作极其粗陋的工具，掌握数以千百计的生活信条和禁忌，其智能需要并不比现代工业民族成员为低。那种认为原始人不需要高等智能的偏见，并无实际调查佐证。今人与原始人智能人的差异不在其高低上，而是在同等智能构建的文化内容上。原始人的文化应用很窄，专用性极高，比如：学习操弓矢得花毕生的精力才会百发百中，具体记熟哪种植物何时可供采集等等，这种文化越出有限的生境一步，将会无用武之地。今人学了化学，知道了水的分子式则可通用于世界，学了一种语言可以被任何一个工业民族的家庭收养，长大后当然掌握好本民族的一切文化素质，不会有任何智能匮乏之感。相反，一个现代人要像俾格米族人那样，学会三箭连发，或在树枝上步行，以及熟记生存必需之物种，恐怕也得竭其心智、体力，像训练杂技演员那样方可奏效，同样不会少付一点心血的代价。

考古资料也可以间接地提供早期文化并存的证据。200 万年前，人类已经踏上文化动物的道路，许多传统文化是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区的人们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而产生的。最闻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西欧奥瑞纳文化、皮里果文化、梭鲁特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在非洲、亚洲、澳大利亚也存在种种文化。

在北非，最著名的有阿特林文化（片石文化）和达班文化（一种石刀文化）。亚撒哈拉人由于发展了对密林地区的适应，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系统，例如，山哥安——鲁彭班传统以石核工具（手斧、凿）为特征，这种工具在森林环境中很有用。在北美，在 1~2 万年前，古印第安人为了制服猎取大型野兽，如猛犸象、驯鹿和现已绝种的骏而发展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凹槽矛头工具，形成特有的文化。到公元前 1 万年，世界的冰冷期状况渐渐变得温和起来，整个世界，海平上升，最后淹没了在冰河期许多高于海平的地区，白令海峡、北海的部分海域，以及曾把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连在一起的广大地区。

在北方地区，较为温暖的气候带来了显著的变化，如苔原为硬木林所代替。在这个过程中，北方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赖以获得食物、衣服的成群动物从许多地区消失了。有些动物，如驯鹿，迁移到较寒冷的气候带；而另外一些动物，如猛

玛象,则完全灭绝了。因而,北方居民被迫适应新的条件。在新森林中,动物并不像以前那么容易被猎取了,协作性狩猎不那么富有成效了。然而,植物食品却比以前更为丰富了,而且在湖畔、海湾和河流有了新的更丰富的鱼类和其他食物来源。因此,人类种群又在各自所处的生境内发展了独特的捕获、宰杀动物和采集野生植物食品的新方法,也就形成了各共同体独具特色的文化。

从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们搜集的关于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具体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某些趋势:总是朝着愈来愈复杂化、多样化和专门化工具组合发展。根据不同生存背景制造出更有特效的工具,以便更好地利用热带大草原、森林和沿海这些不同的生境。当人类种群增长并散居各地时,地方特色也产生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工具组合体产生了。在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出现了普遍性。虽然有些东西可说明文化联系和相互交流,如细石器工具制造法从西南亚转入欧洲,但地方性特色是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特征。地方特色的延续大原因是由于适应不同生境的那种需求。

在森林环境中,人们需要用有锋利坚固的斧头来砍伐树木;在开阔的热带大草原和平原地区,人们用弓箭来射猎,他们不能靠近野兽;在湖畔和河滨、海岸逐渐形成居住地中,人们发展了鱼叉和鱼钩;在次北极地区,人们需要用于割开海豹和驯鹿硬皮而发明特有的工具;在草地,人们需要用于割庄稼和把可用部分同谷壳分开的工具而进行了创造。可见文化不仅是最先、最重要的一种适应机制,而且从产生就具有极大的差异性,是一种区域性所必需的东西。正如基辛在所言:“尼人分散并适应各种环境中,从北部的干草原和积雪山谷地带,一直到半沙漠地带和热带雨林边缘,地区性的特化现象颇为显著——热带的木工技术很发达,寒冷的北方则用兽皮来做容器……欧洲某些地区的莫斯提制作者,似乎是世界上最嗜食马肉的人。”^[4]可见,生存于不同生态背景的同一种类的人类——尼人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并且在地球上并存并进。

大约在1万年前,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人们的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逐渐改变成以农业和畜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这种获取食物的手段的改变,对人类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人类正在把物质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类就能

变得更加安定,出现成熟的村落,早期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化等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革命。然而,就在这一革命所带来的人类文明并没有实现文化的趋同,而仍然出现极大的文化差异性。如在新大陆的新石器时代民族的文化中,狩猎和野生食品的采集一直是重要的因素。纵使在气候允许的地区也种植玉米和其他作物。但是显而易见,多数美印第安人从未经历过从狩猎和采集到生产食物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

农业是从欧洲和亚洲独立发展起来的。作物不同是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特征所致,如从墨西哥动作布拉州的特华坎河谷发现的考古资料显示:玉米、大豆和南瓜一类的作物在食物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在西南亚山地一带的人们却有一种周期性的狩猎和采集方式,以利用不同环境地带的资源。在南美洲也如此,一些先在墨西哥种植的作物最后到南美洲栽植,但在南美洲栽种作物偏重于根块作物如马铃薯、甘薯和木薯等,而不是南瓜、大豆、玉米之类,在动物驯养方也有差异,南美洲主要驯养豚鼠、美洲驼、羊驼和鸭,但墨西哥只驯养狗、火鸡和蜜蜂。而在秘鲁海岸的人们从狩猎和采集向生产食物转变可能是由于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料越来越短缺而引起的,其农耕看来似乎是一种最后的生计策略。

就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散和特征看,不仅明确地反映出几个文化中心或系统,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族集团的情况。在仰韶文化及其发展出来的龙山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夏或华夏民族集团;在大汶口文化及其发展出来的山东龙山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东夷民族集团;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南方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南蛮民族集团;在新乐下层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北方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北狄和东北地区民族集团;在马家窑文化和西部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和相互关系中,逐渐形成了西戎民族集团。^[5]此外,有至今仍川滇黔彝族完整保留的以虎图腾和十月太阳历为主要特征的金沙江文化群落;^[6]以高原游耕、游牧文化为基质的甘青高原上的古氏羌族群;有以稻作和牛栏式建筑为基本特质的百越族群,还有以铜鼓文化为代表的百濮狩猎族群等。这些不同的早期民族集团,或采集或狩猎,或耕地或放牧,展示了人类早期共同体创造着不

同的区域性文化类型与样式，展示出不同人们共同体的文化个性。

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带来的不同人们共同体的文化并存，在人类历史上的价值何在？人类贵为万物之灵，为什么不懂得少创造异种文化，这样既省事又有利于沟通这么简单的道理？不是如果没有异文化的并存不就没有误解、冲突和战争了吗？人类不就是更能节约资源，实现人类大同吗？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为了“节约”。一是智能的节约；二是资源的节约。其实，要把握一种具体的文化或同时掌握两三种文化，个人的智能是绰绰有余的，但若掌握一种流行于世界的民族文化，则是任何人都力不从心的事情。试想爱斯基摩人有什么必要去认识热带雨林的植物以备采食；而俾格米人又何需去记忆海豹出现的规律呢？但俾格人却拥有一种对热带雨林了如指掌的具体文化；爱斯基摩人必须掌握一种对北极生物无所不晓的具体文化。人类创造了异文化，是使之各自有效地为征服利用协调特定的生境，而一个人只需主要把握其与生境有直接对应关系的文化，便可以正常生存，这正是对人类智能最有成效的节约。

地球上的人类生存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各地资源差异极大，若世界上仅有一种文化，人类就只能按同一的方式、习俗、嗜好去生活，这必然

造成消费单向的严重后果，这后果是地球所无法承担的负荷。比如生产同一产品——小麦或者大米，在世界各地的代价差异是惊人的，其代价可以高达数百倍之差。若同一文化引导出的全人类偏食，必然是人类支付不起的代价。更有甚者，人类文化的划一需求，引导的生产单一化，必定引起地球表生态均势的破坏，最终将毁掉人类生存的基础。因此，各人们共同体异文化的存在，正是对自然资源最有效使用的必然结果。当然这些认识是人类经过磨难后才悟出的真谛。早期智人在开始构建文化时，这一真谛是一无所知的。但是自然是无情的，任何一种文化的无限扩展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是绝灭性的代价。异种文化的并存发展正是人类的经验，也是自然的复杂性必然模塑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刘禾. 理论与历史 东方与西方[J]. 读书, 1996(8): 3-11.
- [2] 泰勒. 原始文化[M]. 连树声,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87.
- [3] 施琳. 经济人类学[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 212-213.
- [4] 基辛. 当代文化人类学[M].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81: 56.
- [5]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98.
- [6] 刘尧汉, 卢央. 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 268.

Nations and Cultures Produced from Views of New Evolution

LIU Jing-hui

(Department of Editorial,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Hunan 418008, China)

Abstract: The production of nations and cultures is a straight line evolution course based on the classical evolution. However, the culture media persons think tha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produce culture. Only after the nations who are of creative powers produced can the culture be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the cultures spread. The production of nations included that firstly the culture links the human community, and the secondly th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e different nations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being together. Although the basic unification of human being in historic culture, the cultures of human being varied greatly and it diversified after the long tim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comprehend and explain the fundamental issue where human being from and to,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production of nations and the issue of production of na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s.

Key words: nations; culture; production;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高 武)